

分分合合方濟會

夏志誠

方濟會八個世紀的悠長歷史，當然得從會祖方濟創立這個團體講起。1209年，方濟帶同11位兄弟來到羅馬若望拉特朗大殿求得教宗依諾森三世的口頭批准，這一年也就被視為方濟會的開始。順帶一提，當時修會的名字是小兄弟會，只是後來方濟太出名，人都以方濟會稱之。

方濟到文德

方濟在生時，修會的發展已經十分迅速，從1209年的12人，至1217年的至少3000人。12年間，增長的速度達25倍！可是，量的增加也帶來質的改變。很多人只是慕方濟之名而來，對他創立修會的精神及理想，並不了解。當時方濟亦是來者不拒，在修會草創的初年，完全談不上分辨聖召或正規培育。迅速膨脹的團體，不多久就陷入內部矛盾，尤其圍繞著如何演繹和生活貧窮的理想。

1226年，方濟逝世，團體內部的問題並無逝去。隨著亞西西方濟大殿的興建及落成，兄弟們之間的不和愈來愈白熱化。為了化解分歧，1230年，修會派出一個包括聖安多尼在內的五人代表團，向當時的教宗額我略九世，亦即方濟生前的好友胡高林樞機，尋求對會規及方濟遺囑一個教會官方的解釋。及後，教宗指出，要求較會規還要嚴格的遺囑，只是方濟一種心意的表達，對兄弟們並不構成良心上的責任。教宗亦同時宣佈，一切方濟會的

財物，均在他的名下，因此修會仍是一無所有的。此外，兄弟們可以找一位可靠的中間人代理財務事宜，以保障他們能一方面解決生活的種種問題，另一方面亦能妥守會規對貧窮的要求。教宗這樣的解釋及安排明顯有利兄弟們對會規採取較寬鬆的落實。

可惜，教宗的權威並未能遏止修會內部在貧窮問題上的紛爭。此時，漸漸出現有兩類不同的修院建築：在城市的，較為講究、寬敞，有偌大的飯廳，華美的聖堂，齊全的圖書館等等；在鄉間荒野的，狹小、簡陋、樸實無華。兩類修院代表著兄弟間兩種不同的生活取向，前者側重鑽研學問，認為這樣才能服務教會，多做牧民工作，他們傾向接受對會規較為寬鬆的解釋。修會的長上多由他們出任，被視為團體的「臺權派」。後者卻重視祈禱苦修，以堅守貧窮為己任，對會規採較嚴格的字面解釋。由於不重追求學問，他們大都處於修會的權力邊緣，日後被稱為「靈修派」。這兩派的出現對修會由 13 至 15 世紀之間的歷史有決定性的影響。

與此同時，修會亦愈來愈步向非神職化。方濟創立修會時，在團體中並無神職與非神職的分別。換言之，所有兄弟都是平等的，都能出任團體內的任何職位。可是，自 13 世紀中葉，非神職兄弟便被排斥在修會的管理階層之外，不能擔任院長、會長等的領導職務，他們儼然成為修會內的二等成員。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梵二之後才有所改變，不過，亦只能出任院長而已。由於非神職兄弟大多數傾向「靈修派」的精神，因而神職化的發展亦加深了兩派之間的矛盾。

聖文德出任總會長的時期（1257-1274），藉著他的智慧及個人的聖德，促使兩派兄弟暫時放下干戈。他一方面鼓勵兄弟們以學習充實自己，另方面亦提倡微末貧窮是小兄弟的生活方式。由

他主持在那邦（Narbonne）的總會議頒佈了修會歷史上的第一部會憲，對方濟 30 多年前撰寫的會規作了適時的演繹。

出任總會長前，文德是巴黎大學的教授，僅由這一點已經可以讓我們留意到當時方濟會士在歐洲學術界的地位。事實上，方濟逝世不久，修會就在法國巴黎、英國牛津、劍橋、意大利博倫那（Bologna）及德國科倫（Cologne）等地的大學附近建立起為培育年青會士的會院。一些顯赫的教授亦先後加入修會行列。這樣的發展固然為小兄弟會帶來聲譽，但也加深了與「靈修派」兄弟之間的隔閡及招來其他非修會教授們的攻擊。這些學者對會士引以為傲的貧窮精神提出嚴厲的質疑，認為徹底放棄一切財物並不符基督及宗徒們的教導，並且指出小兄弟們雖然在名義上不擁有任何財物，但實際上並不缺任何東西，因此小兄弟所度的是虛偽的貧窮生活。文德及不少會士都認真的著書立說，對這些指責一一駁斥，但由此可見，彼此間張力之大。

靈修派興衰

里昂大公會議（1274）期間，文德逝世。與此同時，有傳言說當時的教宗額我略十世將要求方濟會接受財物，不再以自己名義代小兄弟來擁有。一批在意大利中部的會士信以為真，認為這樣的發展將會使修會進一步遠離會祖的教導。於是他們決定要坐言起行，組織團體更嚴格的遵守會規，以活出修會原初精神。這種發展使「靈修派」不再單純是在修會內的一種傾向，而是演變成一種生活方式，修會內的另類團體。他們中間有不少謙遜、聖德出众的會士，但也有些兄弟，大肆攻擊聖統制及批評修會領導層。

13 世紀末，部份靈修派兄弟從教宗賽萊斯蒂五世 (Celestine V) 取得批准，可以在修會之外建立會院，單純而不加入教會注解的來遵守會規。可惜他們在其他靈修派及修會團體兄弟的不諒解和夾攻下，走向極端，最後甚至不承認接任賽萊斯蒂五世的教宗，終被教會施予絕罰。

這一小批靈修派的兄弟雖被逐出教會，但修會內兩派兄弟的緊張關係卻更趨熾熱。強調為教會服務的，認為修會必須擁有寬敞的會院，教宗頒賜的種種特權及鑽研學問的會士；靈修派的兄弟則認為，回到修會草創時期的貧窮和流浪傳福音的生活才是首務。可惜，有部份靈修派兄弟走向極端，帶來悲劇。

面對不絕的爭論，教宗若望廿二世(1316-1334)顯然是失去耐性了。他決定徹底鏟除靈修派，把一些兄弟處以絕罰，一些放逐，還把一些極度頑劣，不肯離棄異端言論的予以火燒極刑。另一方面，他責成方濟會要重新審視他們如何理解「一無所有」的貧窮聖願，因為按照當時方濟會的說法，這聖願乃基於耶穌及宗徒們在世上是一無所有的緣故。不多久，修會在 1322 年的總會議中重新肯定這說法，並給教宗正式的回覆。

這樣一來，倒成了方濟會質疑教會擁有財物的合法性。若望廿二世旋即「反攻」，發表通諭，宣佈他無意繼續做方濟會財物名義上的擁有人。教宗的決定嚴重挑戰會士們認為自己度的是徹底貧窮生活的想法。不多久，教宗再以通諭指出，否認基督及他的門徒在世上會擁有和使用財物，乃是異端之說。

至此，教宗與修會之間的矛盾，儼然形成。1324 年，支持方濟會的巴伐利亞公爵路易指控若望廿二世為異端，使矛盾加劇，導致教宗把總會長囚禁起來，並委派一位樞機暫為管理修會。當

路易於 1328 年進入羅馬登極為皇帝時，他宣佈若望廿二世為「反基督」，予以罷免並指派一位方濟會士為教宗，取名尼各老五世。此時教會與方濟會間的衝突無疑達到難以收拾的局面。幸好，天主還是歷史的主宰，五年之後，尼各老逝世，方濟會於翌年(1329)推選一位若望廿二世的好友為總會長，這樣，雙方的隔閡才得以緩和。

嚴規派崛起

進入 14 世紀，靈修派的團體雖被悉數剷除，但會內要求改革的呼聲卻絲毫未減。1348-50 年蹂躪整個歐洲的黑死病使修道人數銳減，修道生活鬆弛，入會者質素參差，凡此種種卻變相促使有心的會士更渴望進行改革。1368 年，一批兄弟在取得總會長同意後，於亞西西附近開始他們嚴守會規，貧窮簡樸的隱修祈禱生活。事實上，他們的精神與上世紀的靈修派無異，但在實踐上卻更為成熟，不走偏激，亦不以建立新修會為目的。

這個日後被稱為嚴規派的兄弟團體，發展迅速，而且人才輩出，很快便在人數及影響上超越原來的住院派。1430 年的亞西西總會議議決全面改革修會，尤其對貧窮願採取更嚴格的解釋及落實。可惜會後總會長在住院派兄弟的強烈反應下翻案，並取得教宗馬定五世准許，容讓修會藉著財務代理人，保管及處理任何財物。這准許被視為是住院派的「大憲章」。

翌年，教宗馬定逝世，新任教宗卻支持改革，批准嚴規派能有自己的副總會長，擁有實質的管理權，無須事事聽命於總會長。另一方面，教宗又將聖地監護權委予嚴規派。自此，兩派雖在同一修會內，但卻已是有名無實的了。

1446 年，教宗歐靜四世（Eugene IV）頒諭，容許嚴規派可以推選自己的副總會長，住院派的總會長只能確認，無權否定。此外，亦規定嚴規派的會院不能轉投住院派，但住院派的會院卻可以自由進入嚴規派。這樣的發展無疑使兩派兄弟更進一步的走向對立。

踏入 16 世紀，長久對抗終於導致制度上的質變分裂。1517 年，教宗良十世見兩派的分歧日深，怕為教會帶來更多負面影響，諭令方濟會一分為二：即以恢復原始精神為己任的嚴規會，及認為修會要適應時代，以服務教會為重的住院會。

不過，非常可惜，分裂解決不了修會團結的根本問題。在嚴規會內，由於地理及政治等因素，早已埋下進一步分裂的種子。意大利北部的天險亞爾卑斯山是地理因素，使兄弟之間形成山內（以意大利為主），山外（以意大利以外為主）兩派。政治因素主要來自西班牙皇室。在他們的影響之下，總會長一職，在分裂之後的整整十年皆由西班牙籍會士擔任。

分裂與合一

1525 年，修會一分為二的第 8 年，在意大利中部，嚴規會的一位出色宣道兄弟，求得教宗特准，自行以更嚴厲的方式生活會規，不久即有其他弟兄加入，形成一股在嚴規會內的改革派別。嚴規會的長上們雖然竭力阻止壓制，但成效不大，三年之後，改革派投靠住院會，取名加布遣會，他們對遵守會規的原始精神更為嚴格，例如：每天作兩小時的默想，半夜誦唸日課，飲食上做補贍，日常所需以靠施捨為生，為人服務不收酬勞，亦沒有財務上的代理人制度等等。及至 1619 年，加布遣會終取得教宗通諭，

與住院會分離，正式取得獨立地位。方濟會發展至此，形成了嚴規、住院及加布遣會鼎足三立的局面。

話雖如此，但改革之火卻仍然在整個方濟運動內此起彼伏，為人數眾多，幅圖廣大的嚴規會更是如此。有趣的是，每次改革運動的產生都是誕生在簡陋的隱修院之內。這種一再重複的現象，揭示出深長的祈禱常是革新生活的龐大力量。就這樣，16世紀的嚴規會在意大利產生了改革派，在法國產生了沉思派，在西班牙產生了赤足派。他們都願意度嚴格的貧窮生活，努力落實會規的原始精神，但同時仍選擇留在嚴規會內。

17，18世紀，嚴規會內的各派（住院會及加布遣會的兄弟們，無論在數目上，牧民上及福傳工作上都有長足的發展。可惜好景不常，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1789)使這個複雜而龐大的小兄弟家庭受到重創，之後的復甦過程卻十分緩慢。及至19世紀末，在嚴規會中才有可見的跡象出現，包括：出版「修會年鑑」、興建大學，重新推動海外福傳及重建總院等等。

本身為在俗方濟會士的教宗良十三世，十分關心方濟會的發展，他認為派別林立，整體人數不多，卻又彼此不和，這種情況為方濟會，以至為全教會，都無益處。因此他自1895年的亞西西總會議中，就提倡嚴規會內的各派要進行重組合一。兩年之後，徵得大多數會省的同意，教宗頒諭把嚴規會內的各派正式統一，組成一個修會，定名為小兄弟會，其餘兩個方濟會的派別則定名為住院小兄弟會及加布遣小兄弟會。香港的方濟會就是小兄弟會，從精神上來說，當然有八百年的歷史，但從制度上來說，它才不過一百多年而已。

結論

三國演義有云：「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話套在方濟會的歷史發展上，確是真實不過。今天雖然還是鼎足三立，但小兄弟會、住院小兄弟會及加布遣小兄弟會早已由對抗轉為合作。彼此之間有更大的包容、諒解及尊重。三位總會長有定期的正式會議及聯合文告，而三修會之間的兄弟亦有頻繁的正式與非正式的溝通及合作。很明顯的，是大家都瞭解到真正的貧窮精神，並不在於字面上如何遵守原始會規的要求，而是在愛內空虛自己，懷抱別人。事實上，主耶穌就是這樣活出貧窮的。

不過，若沒有過去八百年的分分合合，很可能到今天我們還是不理解這簡單的道理哩！